
罗福颐《增订汉印文字征》述略

——兼议罗振玉序言所述整理古文字方法

Luo Fuyi'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Han Dynasty Seal Legends*": with a Simultaneous Discussion on Methods of Collating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Presented by Luo Zhenyu in his Preface

白建新

Bai Jianxin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考察《汉印文字征》的版本源流和同类书比较，评介罗振玉指导罗福颐编著本书的体例成就，认为以《说文》为纲整理金石文字是古典金石学为古文字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并介绍此次重刊的罗振玉序言，略述罗振玉这篇序言根据考释殷契文字所获心得提出的整理古文字材料的观念与方法。

关键词：

金石学 古玺印 《说文》学 古文字学 罗振玉 唐兰

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origins of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Han Dynasty Seal Legends* (*Hanyin Wenzhi Zheng*), and comparing it to similar publications, the article evaluates the achievements on stylistic rules established by the compiler Luo Fuyi (1905-1981)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his father Luo Zhenyu (1866-1940). It argues that collating ancient epigraphic inscrip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Han dynasty (206 BCE-220 CE) dictionary *Elucidating Pictographs and Explicating Characters* (*Shuowen Jiezi*) i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classic epigraph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logy. While introducing the preface by Luo Zhenyu for the reprinted edition of the *Collection*,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idea and method devised by Luo Zhenyu on collating materials concerning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his own experience in studyi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KEYWORDS

epigraphy, ancient seals, studies on the Han dynasty dictionary *Elucidating Pictographs and Explicating Characters* (*Shuowen Jiezi*), paleography, Luo Zhenyu, Tang Lan

罗福颐先生《增订汉印文字征》，目序《罗福颐集》第六种，2010年6月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同年12月重印。《罗福颐集》共二十种，2009年列入故宫博物院学术出版项目，主编罗随祖先生。各目陆续编辑出版，现已出版并重印的还有第五种《古玺印考略》。罗福颐，罗振玉第五子，1905年生，字子期，晚年自号倭翁，1981年病逝。幼承雪堂庭课，通经籍，喜金石，笃嗜古玺，尤擅摹刻，从无入任何学校学习经历。1923年代父编辑《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¹，1925年以石摹拓家藏汉安国侯错银虎符²，1929年从父编纂《玺印姓氏徵补正》³，1930年受父命编次并释文《贞松堂集古遗文》十六卷⁴，1936年续劳《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⁵。此间及后，于殷契金文、先秦文献、清内阁大库史料、辽金西夏元满洲金石等均有考订。194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专事整理大库史料。新中国成立后供职中央政府文化部文物局，转入故宫博物院。1978年调研究室，怀感知中国共产党“生死人而肉白骨”⁶之心，竭家珍藏⁷，补《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编纂之阙，倾平生之学，著《古玺印考略》、《古玺汇编》、《古玺文编》、《汉印文字征》、《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等传世之作。于同时学人辈，治学植根沃壤，讷言敏于著述；笃实醇厚，纵横广博；著述面貌，别具一格，是为故宫博物院新中国时期古典金石学和文献学传人。

《汉印文字征》1930年由上海蟬隐庐刊行，是罗福颐首次出版的专著之一。197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修订补充本，1982年同社续出罗随祖摹《汉印文字征补遗》。在古典金石学玺印类著作中，《汉印文字征》是字书中的重要著作。在古文字学的玺印文字书中，《汉印文字征》以搜罗丰富，检索便捷而知名于时，对现代读者学习古文字有津梁之功。此外，罗福颐本人于治印篆刻，早负盛名，《汉印文字征》出自罗摹，亦成治印习篆的必备课本。故而，文物版《汉印文字征》行世后二三十年间，重印累累。

2010年紫禁城出版社版《增订汉印文字征》，增订者，罗随祖。罗随祖将文物版《汉印文字征》正编、《补遗》两书依旧例合并，重刊罗振玉《序》，是谓之新；正编、《补遗》的《附录》待问字共172字，经积年考识，

1 按：《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有同名异书两个版本。第一种1923年版铅印本收印56方，形近今8开，第二种1936年版影印本收印96方，形近今正度32开，均四眼线装。1923年版罗振玉于《目录》后跋语云：“右古官印五十有六，均近十年来收集者。往岁撰《隋唐古官印集存》，著录者仅九品，余皆成书后所得。癸亥长夏，命儿子福颐编为《贞松堂官印集存》，以补前书之阙。中秋前二日铃竟。松翁罗振玉记。”1936年版《目录》后跋语云：“癸亥夏在津沽，曾命儿子福颐编予家所藏唐宋以来官印五十有六，为《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越十二年，藏印复有增益，颐儿重为编辑，由李唐以逮有清，总得九十有六，仍署旧名付之影印，以饷当世。丙子二月贞松老人记。”此书通行署名“罗振玉辑”，符合事实的明确表述应为：罗振玉藏，罗福颐编。

2 按：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云：民国十四年（1925年），罗振玉岁暮编集1920年至是年文字为《松翁近稿》，增订旧著《历代符牌图录》。罗继祖举其中重要器物略述：有“汉安国侯虎符（安国侯王陵见《汉书功臣表》。错银不能施墨，福颐以石摹刻。此符在雪堂藏品中居秦阳陵符之次。解放后，阳陵由海城于氏转入故宫博物院，今在历史博物馆展览，此符不知所归。”参见《罗雪堂合集》第三十七函第二册卷中第五十七叶正，西泠出版社，2005年。

3 按：罗振玉1929年《玺印姓氏征补正序》言1925年编纂《玺印姓氏征》后，“及春秋三易，续见谱录乃得二十家。顷避地辽东，命儿子福颐别纸编录，又得二百九十有六，其中新增之姓、前录未见者八十二，其他诸姓则前录所有而加以印征者。编写之功，三日而竟。”参见《辽居稿》1931年刊本第八叶背至第九叶正。

4 按：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云：民国十九年（1930年）“冬，[罗振玉]辑三十年来所储金文墨本后出未经着录者逾千器。命五子福颐编次并释其文为《贞松堂集古遗文》十六卷。”《罗雪堂合集》第三十七函第二册卷下第四叶背，西泠出版社，2005年。

5 按：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云：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罗振玉“乃发愤命福颐就所储墨本全部，分类督工写影，编为《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重九工竣，寄海东精印，以饷夙志，而通释之作尤非旦夕事也。”参见《罗雪堂合集》第三十七函第二册卷下第十三叶背，西泠出版社，2005年。

6 按：罗福颐《倭翁七十自述》：“我于1978年转入故宫研究室，这中间经过‘四人帮’的崩溃，我终于看到光明的到来。对党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认为旧知识分子是能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这种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春风化雨，更叫笔者惭愧。”《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二辑，第230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7 按：竭家珍藏，罗琨语。2004年秋冬之际笔者向罗琨、张永山请教编辑《罗福颐集》事。罗琨语：考古所编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时，罗福颐积极贡献早年手拓或者整理的家藏甲骨、金文珍稀拓本，是否收录。笔者明确说，应当收入《罗福颐集》，但希望得到当年制版原件。此后不久，罗莹转告，考古所方面同意提供当年罗福颐为《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贡献的拓本。

移 146 字入正文，余 26 字，是谓之增；全书貌为影印，实同重新排版，其间印文隶定，避讳字还原，订正误漏等，竭力而为，又按照今人通行字书重新编排检字，是谓之订；其中细节，如字头高低、重文间距等等，必亲到机台，身坐大熊侧后，温语耳提面命，逐行逐字过目荧屏后方许打印校样纸本，是谓之劳。卷后罗随祖《增订汉印文字征跋》，大致说明此次增订的内容概要，并简略介绍本书 80 年间递嬗增益的基本情况。

今就罗随祖跋语略言或未言事，取旧籍索解，展述所得。本文通过考察版本源流和同类书比较，评介罗振玉指导罗福颐编著《汉印文字征》的体例成就，认为以《说文》为纲整理金石文字是古典金石学为古文字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并介绍此次重刊的罗振玉序言，探讨罗振玉根据考释殷契文字所获心得提出的整理古文字材料的观念与方法。或有不当，就教于方家指正。

一 编著缘起与蟬隐庐版及其影响

1930 年罗福颐介绍编著《汉印文字征》的起因时说，“稍长，趋庭之余，闻古玺印文字，上可证《仓》、史之旧文，下可考较长之佚字。乃私摹家藏玺印谱录中文字，以补《缪篆分韵》、《汉印分韵》。”¹ 1980 年罗福颐在《倭翁七十自述》中回顾自己的治学起点“是从汉印和古金文入手”，“积年的自习，认识到前人的《缪篆分韵》摹工不精，《汉印分韵》字又太少，此二书对刻印章都不足用。乃从家藏古印谱中摹其文字并及古玺，想补前人之所不及。”² 这是《汉印文字征》的编著缘起。

罗福颐编著《汉印文字征》的同时，还编著了另一种著作《古玺文字征》。这两部书经始于 1922 年，完成于 1929 年，³ 1930 年两书在上海同时刊行。上海蟬隐庐版《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全八册，第一册、第二册《古玺文字征》，第三至第八册《汉印文字征》，四眼线装，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书名叶鲍鼎题署：“古玺文字征十四卷附录一卷汉印文字征十四卷附录一卷检字一卷”。

第一册卷首有罗振玉《序》四叶，其次为《引用诸家谱集目录》两叶，题下自注：“附本书所用略字”，目录列明清民国各家谱集 40 种。正文每半叶六行，行上居中置字头，篆书、楷书各异，每字头下举重文字例和所出古玺印文释文，每一释文下小字注出引用谱集“所用略字”，表示此文此玺所据谱集。如：重文释文下注小字“赫”，即此文出自罗振玉《赫连泉馆古印存》；重文释文下注小字“待”，即此文出自罗福颐《待时轩印存》；重文释文下注小字“举”，即此文出自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重文释文下注小字“郭”，即此文出自郭裕之《续齐鲁古印攷》，等等。正文第一至第十四卷收字共 605 个。第二册《附录》收录待问字。

第三册卷首《引用诸家谱集目录》四叶，题下小字注“附本书所用略字”，目录列明代印谱 11 种，清代、民国印谱 74 种。正文第一卷、第二卷在第三册，第三至第十三卷分居第四至第七册，第八册依次为正文第

1 按：语出罗福颐《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民国十九年（1930 年）上海蟬隐庐版第八册卷末跋语。这篇跋语收入 1982 年文物出版社《汉印文字征补遗》，列为卷前序二，2010 年紫禁城出版社版《增订汉印文字征》编为自序一，见第 9 页。《仓》，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汉初人合并三篇文字，仍沿用《仓颉篇》题名。史，史游，东汉元帝时人，用韵文作《急就篇》。《仓颉篇》、《急就篇》均秦汉字书。较长，即许慎。《后汉书》卷七九下：许慎“举孝廉，再迁除较长。”

2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二辑，第 226 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

3 按：罗振玉为罗福颐《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作《序》云：“儿之为是书也，始于壬戌（民国十一年，1922 年），成于己巳（民国十八年，1929 年）。”1930 年蟬隐庐版第一册第四叶正，2010 年紫禁城出版社版《增订汉印文字征》第 7 页。《古玺文字征》可能在 1925 年即有稿。罗振玉 1925 年 9 月《玺印姓氏征跋》中语“儿子福颐，既为《古玺文字征存》”云云。

十四卷、《附录》、《检字》、罗福颐《跋》。正文体例同《古玺文字征》，收录文 2444 字，合重文 9830 字¹，每一重文之下，均一一注明此文所出古玺具载谱集名目，无一字无所本，严密谨慎，足供考索。

罗福颐编著《汉印文字征》所据各家谱集共计 85 种，毫无疑问源于罗振玉收藏之富。深入探究，亦知罗福颐搜罗之勤。1925 年罗振玉编著《玺印姓氏征》，“所据谱录凡四十六家”，越三年，“续见谱录乃得二十家”²，遂编《玺印姓氏征补正》。据此可知，罗振玉所据谱录不足罗福颐所据谱集之数。罗福颐所据谱集之多，另一重要来源是 1926 年随罗振玉赴沪，获读钱塘丁仁家藏印谱数十种³。

同一时期，先后有两种金石书目列出印谱类目。前一种为宣统二年（1910 年）叶铭《金石书目》，卷末附传世印谱 150 余种，罗福颐判识“太半乃后人作印，以与古铜印谱并列，其体例已乖，况仅著书目，略而不详”⁴。后一种容媛《金石书录目》，列举印谱之数不足 70 种⁵。罗福颐 1933 年刊行《印谱考》四卷，存佚并收，共 146 种。这是国人著作。1934 年日本人太田孝太郎“以见藏为限”，纂辑印谱目录《古铜印谱举隅》十卷，收书共 105 部⁶。故而，罗福颐《汉印文字征》所据谱集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叹为观止。

民国间，罗福颐《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两书皆受学界关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容媛在容庚《金石书录》基础上编辑《金石书录目》，1930 年印行初版，1936 年增补再版。容媛《金石书录目》玺印类字书之属著录：“《古玺文字征》十五卷、《汉印文字征》十五卷、《检字》一卷，上虞罗福颐（子期）撰。民国十九年石印本，用《说文》部目次序排比，除重文外，得二千五百八十二文。”⁷此后不久，海宁朱建新著《金石学》讲述玺印著录说：“古印拓存以外，又有纂其文字，以为印学之一助者，则有桂馥之《缪篆分韵》，袁日省之《汉印分韵选集》，谢景卿之《汉印分韵续集》，及近人孟昭鸿之《汉印分韵三集》，及《印字类纂》，罗福颐之《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等书，亦犹《钟鼎字源》及《隶辨》之编次也。”⁸容媛、朱建新为罗福颐两书定位于金石学著作玺印类别字书序列之中，无可置疑，十分准确。而且，容媛于罗福颐书目后附注“用《说文》部目次序排比”，为罗福颐两书在同类书中过人处张目，一语中鹄。

20 世纪最初的三十多年间，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广泛讨论和激烈论战。特别是殷墟甲骨的发现和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使古文字学受到普遍关注，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时尚。唐兰在其《古文字学导论》1936 年改订版中说：“在这时期里，编集文字的书，可以分为两类（还有继承《古籀补》一类，已见上文），第一类是把各种古器文字分别搜集，罗振玉最主张此说”，“这一派的编集，如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商承祚的《殷虚

1 按：罗随祖统计。参见《增订汉印文字征》，第 743 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

2 罗振玉：《玺印姓氏征补正序》，《辽居稿》第八叶背至第九叶正，1931 年刊本。

3 按：罗福颐《印谱考序》云：“迨丙寅（民国十五年，1926 年）岁，侍家大人游沪滨，又得假读泉唐丁氏仁藏印谱数十种。”《印谱考》第一叶背，1933 年墨缘堂刊本。又，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云：1926 年“四月，[罗振玉]携五子福颐赴沪，寓爱文义路诚意里弟子经家。”参见《罗雪堂合集》第三十七函第二册卷中第五十七叶背，西泠出版社，2005 年。

4 罗福颐：《印谱考序》，《印谱考》第一叶背，1933 年墨缘堂刊本。

5 容媛：《金石书录目》卷四第一叶背至第四叶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乙种之二，1936 年。

6 容媛：《金石书录目》卷四第一叶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乙种之二，1936 年。

7 容媛：《金石书录目》卷四第五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乙种之二，1936 年。容目所云“十五卷”是把待问字《附录》与正文十四卷一并计算。容媛此言“得二千五百八十二文”，与罗随祖统计蟬隐庐版收录字数不同，当是算法各异。

8 朱剑心：《金石学》第 51 页，文物出版社 1981 年据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影印。此书 1940 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5 年修订再版。按：朱建新，号剑心，以字行。此书作者署名“朱剑心”。

文字类编》，朱芳圃的《甲骨学文字篇》、孙海波的《甲骨文编》、容庚的《金文编》、《金文续编》，罗福颐的《玺印文字征》¹、顾廷龙的《古陶文彙录》等，均限于一部分材料。商承祚还有《石刻篆文编》，但未印行。另一类是用各种材料混合编集的，如日人高田忠周所编的《朝阳阁字鉴》和《古籀篇》，材料芜杂，无足取。徐文镜的《古籀汇编》，集《钟鼎字源》、《说文古籀补》、《说文古籀补补》、《金文编》、《古玺文字征》、《殷墟文字类编》六书的正编，删去附录，尚便于初学的查检。”²在这里，很显然唐兰是把罗福颐两书作为整理古玺印文字的代表性著作。

北京大学高明先生是唐兰 20 世纪 60 年代在北大讲授古文字学的助手，现为著名古文字学者。他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中讲授历代古玺的搜集和著录时，对罗福颐这两部著作的代表性，有一段展开评述：“入民国以后，刊布历代玺印的书籍不下七八十种，但是，有些印谱是钤印而成，印数极少，寻找极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一困难，罗福颐先生曾作了不少工作。1930 年，他将多年搜集的古玺文字和汉印文字，分别编成《古玺文字征》和《汉印文字征》合订出版。解放后，又经过长期的资料积累，首先将《汉印文字征》经过增补修订单印成书。有关古玺的资料，也分两部分进行整理，首先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玺，全国各文博单位所收藏的古玺，《文物》、《考古》等杂志曾发表过的新出土的古玺，以及目前所能见到的传世印谱中著录的古玺等，统一编著成一部《古玺汇编》。而且又在《古玺汇编》的基础上另编一部《古玺文编》，该书所录文字虽然是皆引自《古玺汇编》，但仍然是《古玺文字征》的补充。全书共收 2773 字，其中正编 1432 字，合文 32 字，附录 1310 字，这就将目前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古玺资料收为一书，为先秦古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³

以上说明，罗福颐整理古玺印文字所据资料之富，整理所得之多，无人出其右。《古玺文字征》和《汉印文字征》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地位，在民国时期即已经得到社会承认，影响所及，至今仍巨。

二 罗振玉指导罗福颐两书的体例成就及与同类书比较

罗福颐编著《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两书，曾经受罗振玉的指导。罗福颐晚年回顾编书之初，“于时得先人指导说，其类次务以《说文解字》为纲，前人用韵编只取便检，对文字学上是有缺点的，而且这样做，对学习古文字学，对编书的人均有好处。”⁴这是说，罗福颐采用《说文》十四卷五百四十部首的体例大规模整理古玺印和汉印文字，确立《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各为十四卷，收录文字按照《说文》部首排序，待问字入附录另成一卷的框架结构，是遵照罗振玉的意见，在罗振玉的指导下形成的。今天看来，罗振玉的这个指导意见，对于《汉印文字征》屡屡重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有比较才有鉴别。罗福颐编著两书的初衷是要“补《缪篆分韵》、《汉印分韵》”，因而，要客观认识罗福

1 按：《玺印文字征》，即《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的合称。这可能是当时指代两书的通行简称。1931 年罗振玉使用过这一简称，详见下文。罗福颐晚年说到两书，并称为《古玺汉印文字征》，参见罗福颐 1980 年 4 月为《汉印文字征补遗》所作自序，《增订汉印文字征》，第 15 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

2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改订版第十五叶背、第十六叶正，齐鲁书社影印本，第 336、337 页，1981 年。

3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 45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4 罗福颐：《倭翁七十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二辑，第 226 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

颐两书的成就，需要对《缪篆分韵》、《汉印分韵》有一概要了解。

《缪篆分韵》五卷《缪篆分韵补》一卷，桂馥编次。桂馥，字东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二》有传。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选云南永平知县，卒于官。博涉群书，潜心小学，工书法，擅篆印。日取许慎《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历四十年成《说文义证》五十卷。与段玉裁齐名，时称南段北桂，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包世臣评鹭清人书法，桂馥分书列为佳品上¹。

《缪篆分韵》五卷，以韵声为框架，第一卷上平声，第二卷下平声，第三卷上声，第四卷去声，第五卷入声。每卷按照韵书所列字序，以楷书为字头，下列摹印重文和释文，不注所据，间有按语，如上声二十阮下“鄢”字重文，有按语近三百字；且每一韵字下注收文字数，重文字数，附文字数。书名洪亮吉篆书题签，卷首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袁枚序，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盛百二序，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陈鱣序。《缪篆分韵补》一卷，按韵声分为五篇，体例同前，但无收文字数统计。卷首有嘉庆元年（1796年）桂馥自序²。据罗随祖统计，正续共收2182字³。

《汉印分韵》，是简称。此书正编题名《选集汉印分韵》，署名：袁日省予三甫原本，南海谢云生摹录，嘉庆二年（1797年）漱艺堂刊本；续编题名为《续集汉印分韵》，署名：谢景卿纂摹，嘉庆八年（1803年）漱艺堂刊本。正编分上下卷，续编同；以韵声为框架，按韵书字排序；字头正书加单线圆圈，重文摹写印文；官印注出印文释文，如“东”字重文，下注“陇东太守章内”，另一重文下又注“安东将军章内”，私印不注⁴。据罗随祖统计，《汉印分韵》正续两编收字共2396字⁵。

《缪篆分韵》、《汉印分韵》两书，均为乾嘉之际金石学鼎盛时期产生的著作。桂馥治印有时名，他和谢景卿于古玺印文字有搜集之功，整理之劳。当时玺印类著作中出现字书的社会原因，诚如谢景卿所言，一是“为镌摹家所取资”，二是“以补南阁校书者之阙”⁶。这两部书之所以日后流传不广，主要原因是，晚清时开始有旧式拼音传入，民国时，初等教育已经普及拼音，废弃了旧式韵书，按韵取字仅仅限于少数人范围内的特定用途。故而，以旧式韵声为框架的工具书，自然式微。

罗福颐两书编纂之初，有为刻印足用的意思。书成后，以收字数量与桂馥、谢景卿两书论长短有些简单。罗福颐两书在体例上长于《缪篆分韵》、《汉印分韵》之处有三：一是字头见于许书者用篆书，许书不载者用楷书；二是每一重文必有所出印文释文；三是每摹写一重文必有所本，注出所据谱集。故而，桂、谢两家以韵声为框架，罗书以《说文》分部别居，已经不是“补不足”，而是另起别筑，构分庭楼阁，建玺印新序。

1 《清史稿》卷五〇三《艺术二》。

2 按：据嘉庆元年刊本《缪篆分韵》各篇序文，其成书经过大致如下：桂馥笃嗜古铜印，凡南北收藏家，不远千里求之，博采秦汉以下官私符印以及宋元诸家之谱，作《缪篆分韵》稿。其间京师瑛梦禅居士亦有同类编录，闻桂馥已有稿，以所得赠桂馥。桂馥成稿得滋阳苏扈园协助排类，海宁陈鱣缮写，章邱焦绿轩释文，友人沈向斋、黄小香、陈明轩、沈二香、刘松岚、江秋史、司马达甫各出金助刻。安邑宋芝山取稿交旌德李生付梓，但久未见书。桂馥赴云南任前，王葑町向其出示印本，桂馥始见此书。桂馥前书登板后，远近知交多以印文寄示，续辑作《缪篆分韵补》。

3 罗福颐：《增订汉印文字征》，第26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4 按：据正编《选集汉印分韵》卷首谢景卿序、卷尾宋葆淳跋，续编《续集汉印分韵》谢景卿序，其成书经过大致如下：安邑宋芝山在京师与桂馥同好摹印，日同采访辨析，所见汉印不下万方。乾隆四十五年（1789年）宋芝山游吴，受陆贯夫赠袁日省稿，随身十余年。宋芝山嘉庆元年（1796年）游粤，同谢景卿相与论鉴摹印，向谢出示袁日省手稿。谢景卿叹未曾有，又见原稿尚多讹舛，遂代为厘定，命大儿谢云生摹录成帙。此后，谢景卿疑汉篆不止于此，又借阅各家汉印谱，悉心采录，搜罗日广，以见原印为限，纂摹成书，是为续编。

5 罗福颐：《增订汉印文字征》，第26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6 谢景卿：《选集汉印分韵序》，《选集汉印分韵》第三叶正，嘉庆二年刊本。

朱建新所言孟昭鸿《汉印分韵三集》、《印字类纂》，成书刊行均晚于罗福颐两书，姑不置言。他说到的《钟鼎字源》、《隶辨》两部书，都是古典金石学中按韵编纂的字书。《钟鼎字源》五卷，清汪立名编，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成书。是书专采集金文，依韵编次。《文渊阁四库全书》存目。《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是书提要谓，《钟鼎字源》“不知钟鼎之中又有时代之分”，混淆了商周钟鼎金文与秦权、汉灯汉壶铭文的时代区别。¹《隶辨》八卷，清顾霭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书字形广狭与世所刻娄机《汉隶字源》相同，是阴以机书为稿本”²。娄机，宋人，著《汉隶字源》六卷，专考汉碑之作，《文渊阁四库全书》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是书“足为考证之资，不但以点画波磔为书家模范已也”³。

总之，罗福颐两书以《说文》部首目次为纲，同《缪篆分韵》、《汉印分韵》、《钟鼎字源》、《隶辨》这些字书在体例上有着重要区别。在民国以来的古文字学各种字书目录中，罗福颐两书属必备书之一，而上述《汉隶字源》、《钟鼎字源》、《隶辨》这几部字书，往往列目备览书目。

三 以《说文》为纲整理金石文字是古典金石学为古文字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古典金石学在两宋发端之始，于搜集、著录、考订蔚为大观。刘敞《先秦古器图》首开金石著作先河，指明金石古器与文献著述两者的关系，有“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语⁴。其中“小学正其文字”，正是金石学形成后出现金石字书的必然原因。早期的金石字书均以韵声编次。宋有王楚《钟鼎篆韵》，刘球《隶韵》，薛尚功《广钟鼎篆韵》，杜从古《集篆古文韵海》，元有杨鉤《增广钟鼎篆韵》，明以下，先后有朱云原《金石韵府》，清林尚葵《广金石韵府》。按照《说文》框架编次金石字书，是在清代《说文》学兴盛以后出现的。清代《说文》学的兴盛，根源于经学的发达。

清代经学，昌盛一时。皮锡瑞谓清代经学“有功于后学”者三件大事：一为辑佚，二为校勘，三为小学⁵。梁启超评价清代学者的成绩，对《说文》在清代的地位和影响有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自戴震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弟子段玉裁后，“自是《说文》学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因钟鼎文字学发达的结果，对于《说文》中之籀文引起研究兴味，于是有《说文古籀疏补》一类书（庄述祖著六卷，潘祖荫著一卷）。”⁶梁启超说到的庄述祖书，题名是《说文古籀疏证》⁷。唐兰曾经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评价这部书说：“庄述祖的《说文古籀疏证》想建设一个新系统来代替《说文》，但是从不可靠的材料，主观的看法，今文经学

1 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380页。提要云汪立名婺源（今属江西）人，汪立名《钟鼎字源》卷前序言自署“钱塘汪立名”。《钟鼎字源》有康熙五十五年汪氏一隅草堂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205册影印，齐鲁书社，1997年。

2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一《经部小学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357页。《隶辨》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5册，第一至五卷按照韵声收字，第六卷部首，第七、第八卷碑考。

3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一《经部小学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350页。《汉隶字源》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5册。

4 刘敞：《公是集》卷三六《先秦古器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第715页。

5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第330、331页，中华书局，1959年。

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92、19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这里的书名号显然是排印本所加。其实，至少有《说文古籀疏证》和《说文古籀补》两种书。前人把常用或者习见的著作书名简称、并称是常有之事。这里使用书名号标示为一种书，容易误导读者。

7 按：庄述祖，清今文经学常州学派开创者庄存与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二》有传。《说文古籀疏证》，有潘祖荫辑功顺堂丛书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第243册影印。

家的没有条理的玄想，要造一个空中楼阁，把一切文字推源于甲子，这是不可能的。”¹

庄述祖的《说文古籀疏证》，是从经学发达到《说文》学兴盛的潮流在金石学中激荡起的回响。唐兰认为这部书不成功，也举出了另外一部书，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一直到同治光绪时，古器物的发现愈多，如：古玺，封泥，匋器，货布等都有大批的材料，吴大澂除作《字说》外，搜集钟鼎文字和这些新材料作《说文古籀补》，这也是划时代的一本著作。后来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的《说文古籀三补》，却只是依样葫芦而已。”²

吴大澂，字清卿，号恒轩，又号窞斋，江苏吴县人。《清史稿》卷四五〇有传。同治六年（1877年）进士。授编修，出为陕甘学政。光绪间，办理吉林边防，会办北洋军务，历广东、湖南巡抚。甲午战争中督湘军出关作战，兵败革职，卒于家。晚年家贫，售书画、古铜器自给。博通训诂，工辞章，精金石，富收藏，善篆、籀，有时名。所著《窞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古玉图考》皆为古典金石学名著。

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十四卷《补遗》一卷，有光绪十年（1884年）写刻本，光绪二十四年重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243册影印初刊本，中华书局2011年影印重刊本。卷首陈介祺光绪十年序、潘祖荫光绪九年序、吴大澂光绪九年自序，其次有《凡例》十二条，再次为正文十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全书“依《说文》部居，始一终亥，以类相从，有条不紊，一一皆从拓本之真者摹其形，信而有征，省说其文，详解其字，语许君所未尽语，通经典所不易通”³，正文、《补遗》共收古文1198字，重文2393字，合计3591字；《附录》收录待问字542字，重文142字。正文每一重文均注出所据钟鼎名或古玺、古币名。

据吴大澂自序，他在介绍撰著缘起时说，许慎《说文解字》以鲁王孔宅壁中书为古文，他怀疑七国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孔壁书已经不是孔子六经旧简，虽属篆籀，实多讹伪。所以，他三十年搜罗不倦，取古彝器文，择其显而易明，视而可识者，参以故训，附以己意，汇录成编。关于收录的材料，他说：“石鼓残字皆史籀之遗，有与金文相发明者，古币、古玺、古陶器文亦皆在小篆以前，为秦燔所不及，因并录之。”关于纂辑的方法，他说：“盖是编所集多许氏所未收，有可正俗书之谬误者，间有一二与许书重复之字并存之，以资考证。不分古文、籀文，阙其所不知也。某字必详某器，不敢向壁虚造也。辨释未当，概不羸入，昭其信也。索解不获者，存其字，不释其义，不敢以巧说衰辞使天下学者疑也。”

唐兰用“划时代”来评价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不仅是因为这部书是古典金石学著作中第一部以《说文》为纲成功整理金石文字的字书，而且，这部书打开钟鼎、古玺、古币、石鼓、古陶文字的界限，把吴大澂当时所能见到的古文字材料精选收录，熔铸一炉。这是唐兰高度评价吴大澂这部著作建立新方法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经学的发达给小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小学以精审的校勘，通达的训诂支撑经学的理论和研究。同时，古典金石学的繁荣昌盛给古文字学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材料。整理这些丰富材料，需要一套学术界公认的体系。《说文解字》以五百四十部首贯穿一万多个字形，使用篆书为主体解释文字，奠定了它在古文字学上无可动摇的经典地位。当时的《说文》学风生水起，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义证》，严可均《说文校议》，王筠《说文释例》各享盛名。《说文》学的这些重要成就，对于当时的金石考订与文字

1 唐兰：《中国文字学》第2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 唐兰：《中国文字学》第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 潘祖荫：《说文古籀补序》，第二叶。

整理必然产生重要影响。按照《说文》体系整理日益丰富的金石文字，逐渐成为学者们新的利器。金石学者们借鉴《说文》学的成就汇集和整理金石文字，从而，使古文字学别开生面，建立起古文字学新的材料序列。无可否认，这是古典金石学为古文字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然而，吴大澂个人所见所藏毕竟有限。罗福颐在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数十年后，在罗振玉指导下编纂《古玺文字征》和《汉印文字征》两书最有意义的贡献，是以搜罗之富，把当时学者可以见到的古玺印文字集体搬运到古文字学的材料序列中。或曰：罗福颐两书，架设起从摹写古玺印进入到古文字学材料序列中间的桥梁，从而，使古玺印文字为证经考史建立起超越以往的可靠体系。这也正是罗福颐两书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在数十年后依然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和旺盛社会需求的主要原因。

四 重刊罗振玉序述要

2009年编辑《增订汉印文字征》时，罗随祖示笔者蟬隐庐版罗振玉序，遂重新刊载，置于卷首。第一次印刷前，因为新版栏格比旧版行长多两个字，仅作了剪裁推行事。第二次印刷前，考虑到为现代读者提供阅读方便，还要与全书面貌保持一致，斟酌再三，增加了旧式句读。封版之后，为撰写此稿，查阅旧籍，又有所发现。

罗振玉此序有1930年、1931年两见，加上此次增订版重刊，实为三见。首见是在蟬隐庐版《古玺文字征》和《汉印文字征》合订本第一册，时在1930年，文后自署：“庚午七夕后三日贞松老人书于辽东寓居”，即现在置于《增订汉印文字征》卷首之《序》。另有一见，是在罗振玉《辽居乙稿》民国二十年（1931年）石印本第十四至十八叶。1930年、1931年两见文字，多有差异，显然是在文稿收入《辽居乙稿》时作者有过乙删增改。因为2010年增订版重刊罗振玉序是以蟬隐庐版序言为底本，现将其中差异重要者一一转述。

第一，标题。蟬隐庐版第一册书名叶后次叶即此序文，无标题，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第一至第四叶正末行结束。现在增订版罗振玉序文的标题和署名，均为2009年编辑时所加。《辽居乙稿》目录、正文标题均作“玺印文字征序”。为便于区别，以下将蟬隐庐版序文简称甲本，但因此本稀见，紫禁城版《增订汉印文字征》为新书，故以下说明使用增订版页码、行次。《辽居乙稿》本简称乙本。

第二，甲本第1页末行：“古金石刻”，乙本作：“古今石刻”。

第三，甲本第2页第6行：“鬲戈”，乙本作：“鬲侯戈”。

第四，甲本第3页第4行自“又奉作𠄎，亦见散氏盘”至第6行“释奉为得”共52字乙本不见，代之以“附录有𠄎字，虽不可识，然亦见虢叔钟、鬲钟”17字。

第五，甲本第3页末行：“知玺文之𠄎即夷翟之翟又”11字，乙本不见。

第六，甲本第6页第5行：“象足形以守卫”，乙本增两字，作：“象足形相错以守卫”。

第七，甲本第6页第10行，“许君生汉季叶，已昧其初形矣”后，乙本增：“《说文》无𠄎字，汉印有𠄎审、𠄎裴，金文遂𠄎譔鼎作𠄎，其文从𠄎、户，殆即啓之重文，许书佚之”，共35字。

第八，甲本第6页第11行：“亦间有疏失”，乙本作：“亦尚有疏漏”。

第九,甲本第6页第11行“如因《汗简》”之“如”字下,乙本增:“𠄎、纒二字,并见《说文》,误入《附录》。又《附录》中之𠄎、𠄎,从口从耳,殆许书之聿;𠄎从耳,壬声,殆听之重文;亢仓子耳眇目旺,其字径作旺,𠄎从𠄎从车,古金文𠄎字,或省作𠄎家敦,𠄎西敦,此殆亦𠄎字。𠄎即公字,亦见稣公子敦。又,《汗简》翟作𠄎,知𠄎即夷翟之翟。玺文有𠄎字,《附录》又有𠄎,知𠄎亦即𠄎字,但省白耳。至”,共118字。

第十,甲本第7页第6行:“举一而费百”,乙本作:“务小而失大”。

第十一,甲本第7页第6行至第7行“庚午七夕后三日贞松老人书于辽东寓居”17字,乙本无。

其余还有三两处个别文字更改,不涉文意更张,兹不录。

罗振玉此序1930年本与1931年本虽有以上诸多差异,但都是在论述中的举例说明范围内,基本观点和认识无变化。两见文本如此差异,符合罗振玉著述精益求精,迭经增订的风格。

1978年,罗福颐补充修订《汉印文字征》未收罗振玉此序。1982年,《汉印文字征补遗》有两篇序言,序一是罗福颐1980年4月手书新撰序,序二是罗福颐手书1930年蟬隐庐版原跋,亦无罗振玉此序。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学术界通行认识的环境中,是既确保安全又隐存无奈的正常现象。

在罗振玉有关古玺印的几种著述中,这篇序文是论述古玺印文字的古文字学史料价值较为详尽的一篇。而且,此序写于1930年,比1915年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序言》晚十几年,自然有这段时间新的认识。在这篇序文里,罗振玉指出了古玺印文字的历史地位和整理方法,今天看来,依然有重要意义。

关于古玺印文字,罗振玉明确划分为古玺文字、汉印文字。1925年,罗振玉编纂《玺印姓氏征》时,在跋文中说:“予既撰《玺印姓氏征》,以玺印尤关于小学,欲继是而为《文字征》。顾玺印文字应析为二。古玺出于秦前,其文字别为一体,与古文或异。儿子福颐,既为《古玺文字征存》,予将专就汉印文字说之,约其大凡,厥有二端:一考订许书,一补许书佚字。”¹1930年,罗振玉继续把先秦古玺和汉印区别看待,他在序文开篇指明:“古玺印文字,其在周季者,为古文之一体,专以摹印,故与古文或异。及汉两京官私印信,则易篆势之婉曲繁缛而为简直方正,其体又近古隶书,往往省变,违六书之正。然大半在许祭酒作《说文解字》之前,故可以考古文,可以证许书。”²这两段话,都是把周秦之际作为划分古玺与汉印的界线。

罗振玉的这种认识毫无疑问对罗福颐具有重要影响。罗福颐早年把《古玺文字征》和《汉印文字征》编为两种著作,到晚年,《古玺文字征》扩展编成《古玺汇编》、《古玺文编》,《汉印文字征》仍旧独立其外。《古玺汇编》的《编辑说明》开宗明义说:“古玺是指秦以前的官私玺印。目前传世的古玺,大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它是当时政治关系的凭证和经济交往的信物,对研究当时历史和汉字发展有一定的价值。”³《古玺文编》的《编辑序言》同样定义说:“古玺文字是指秦以前官私印玺上所用的文字,它和同时期的匋器、青铜器、货币、符节、玉器、刻石、竹简及盟书等文字一样,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和汉字发展的重要资料。”⁴对于汉印,罗福颐在为《汉印文字征补遗》所作新序中说:“昔人称传世古铜印,统谓之汉。今日验之,

1 罗振玉:《玺印姓氏征》卷二跋文,1925年东方学会铅印本。

2 罗振玉:《增订汉印文字徵》,第1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3 故宫博物院编《古玺汇编》,第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按:《编辑说明》署名“故宫博物院《古玺汇编》编辑组”,这是当时著书大多数采用集体署名的一种通例,显然定稿人是罗福颐。

4 故宫博物院编《古玺文编》,第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按:《编辑序言》署名“故宫博物院《古玺文编》编辑组”,并且说明:“本书由罗福颐先生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王人聪、叶其峰、纪宏章。”同书第2页。

实际秦汉南北朝官印多出自明器，其中固有两汉物，然魏晋以后作品亦居其半。至于私印亦类是。此书昔沿旧称，谓之《汉印文字征》者，今日视之，名实有不相应，只此补遗之作，必沿旧名，举此一端，是有待诸将来更正者。”¹这种认识，显然来自罗福颐晚年走遍大江南北检阅古印的经历和积年考证鉴识的结论。

关于汉印文字的作用，罗振玉1930年说的“考古文”、“证许书”，比1925年说的“考订许书”、“补许书佚字”的范围要宽广，概括更准确。1925年的说法，都是局限在许慎《说文解字》。1930年的说法，“考古文”的范围，可以上推到甲骨、金文；“证许书”的内容，可以证有，可以证无，也可以正误。故而，罗振玉1930年言汉印“可以考古文，可以证许书”，无疑是高度概括，非积数十年学识无由下此老辣断语。

关于整理古玺印文字的方法，罗振玉总结罗福颐编著两书说：“儿之为此书，盖上溯殷虚遗文，古金、石刻，并考许书及郭氏《汗简》所载古文，以旁求之，遂得其大凡。”²随后，罗振玉举出60余字例，分别说明玺文“与殷虚遗文合”的有天、牢、与、吉、明等字，“与古金文合”的有皇、苏、夔、皮、郑、攸、相、朱、休等字且每字举出所见钟鼎的器名，与石鼓文、魏石经合的有角、宰字，“与《说文》所载古文合”的有弃、虐、期、吴、州等字，“与《汗简》合”的有葛、谒、羯、碣等字。罗振玉还说：“此四者之外，又有可以意求者。”“是来去之去，喜乐之乐，初固各有本字，今作去与乐者，皆假字也。”³这里的“四者”，前三种是金石实物上的铭刻文献，即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和汉魏石经，第四种是传世著述文献，即汉许慎《说文解字》、宋郭忠恕《汗简》。对于汉印文字，罗振玉举出十几个字例，用金文、石鼓文、汉魏石经字和汉印文字相互对照，“以求《仓》、史之旧”，以证许书或有或失，说明“许君生汉季叶，已昧其初形”。⁴

在这篇序文里，罗振玉归纳的整理古玺印文字方法是，以比勘偏旁部首为中心，纵向上溯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和石经，横向推求本字与通假字，综合运用不同材料的字形并加以历史考证的办法求证。这种方法，是他早年作《殷虚书契考释》基本方法的延伸。罗振玉1914—1915年“键户四十余日”，撰“考释六万余言”，成《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他在序言中总结自己的基本方法是，“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扁鐏为开”。⁵对照这段话，可以证明，罗振玉在1930年所说的关于古文字的整理方法，是在多年考索甲骨文、金文和古玺印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古典字书和目见金石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1915年和1930年两段话前后一脉相承，但是1930年所言内容更为丰富，表述更为细致。

正是罗振玉考释殷虚遗文“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凿破混沌，所得可观，卓有硕果，建立起甲骨文学科，才有他以自己进行科学探索所获心得传授给罗福颐，指导罗福颐编著两书“类次务以《说

1 罗福颐：《汉印文字征补遗》，第1、2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增订汉印文字征》，第15、16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2 罗振玉：《增订汉印文字征序》，罗福颐《增订汉印文字征》，第1～2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3 罗振玉：《增订汉印文字征序》，罗福颐《增订汉印文字征》，第2～4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4 罗振玉：《增订汉印文字征序》，罗福颐《增订汉印文字征》，第4～6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5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序》，《殷虚书契考释三种》，第97页，中华书局，2006年。按：罗振玉自署序言日期为“甲寅十二月十八日”，是为1915年2月1日。《殷虚书契考释》，1915年永慕园刊行。时罗振玉流寓日本京都，稿成交王国维楷书誊写，其中甲骨文由罗振玉填写后影印出版，故行世面貌为王国维手书。此后，罗振玉因政治立场而形象受损，遂牵引出罗“币购”王稿之说，又有署名罗著实为王作或者罗王合作等等说法。陈梦家据罗振玉手书原稿和王国维校写稿校对，在《殷虚卜辞综述》第58页确认王国维校写《殷虚书契考释》只有行文字句的更易而无重大增删（科学出版社，1956年）。支持这一结论的还有王世民《殷虚书契考释的罗氏原稿与王氏校写》，张永山主编《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世民《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稿本校勘记》，中国文物学会等编《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罗琨《读殷虚书契考释初版校补本》，《殷虚书契考释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

文解字》为纲”。试想，自两汉经师以下到两宋刊刻盛行之前，有多少古代学术不是父子口耳相传，庭授指点，薪火相传。这是罗福颐从无入任何学校求学经历而25岁编成《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两书，奠定一生治学出发点的关键所在。

从罗振玉的归纳可知，在证求具体字形上，他没有在钟鼎、古玺、古币、石鼓、石经等不同材质的古文字字形之间设置界限。罗振玉这种做法和吴大澂的“划时代”整理方法并无二致。此外，对古文字材料按照分类整理成帙，现在也是古文字学术界的通行做法之一。

罗振玉指出汉印的“考古文”、“证许书”作用，在罗福颐1930年的两书跋文¹中有着充分体现。罗福颐以“证许书”为中心，既证有，又证无，继而证误。证有字，直观两书字头篆书即一目了然。证无字，主要是证明许书虽不载，但不是俗字，而是正字。罗福颐针对泥古许书的现象说：“近世大师，墨守太甚。凡许书所无之字，概诋为俗作。大徐新附四百余文，遭人弹射，几无完肤。私以为亦过矣。较长之书，九千余字；传世十三经，仅七千言耳；而不见许书者，多至七百八十余。谓今经典习用之字，不见许书者皆正字。固未可必诋为俗作，亦非平情之论也”，²他举出许书不载，但见于经典和金文、甲骨文的字有：矩、寮、愈、腊、妥、旃等字；又举许书不载但徐铉新附字中，已在汉印具文的有24个字。罗福颐的这种看法，得到唐兰的支持。1949年，唐兰说：“有些《说文》学者专做些辨字证俗的工作，只要《说文》不载的字就是俗字，一定要在《说文》里找出本字，这种尚古癖，在我们看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³关于证误，罗福颐据《汉书》考证印文中的地名，指出许书失载字；并且根据汉印文字，指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木部删去穆字，人部删去件字，均见于汉印，所删未必悉当；其他可议的还有璿、锋、扰等字，均见于汉印，等等。

以上引述，说明罗振玉1930年为罗福颐《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所作序文，是一篇关于整理古文字值得重视的文献。罗福颐两书的编著，是在雪堂指导下整理古玺印文字别立框架的集成著作。这是雪堂父子在古典金石学字书向古文字学字书转变中做出的重要贡献。雪堂父子于此，有方法，有实例，睿识独到，成就硕然。今日学林，依然是在当年罗振玉、罗福颐父子以及同一时代学人开辟山林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五 结 语

1949年，唐兰评价说：“罗振玉作《殷虚书契考释》建立了殷虚文字这一个学科，他认为金文，古玺，陶器，货币等材料，应当分开来搜集整理，二十年来，他的儿子罗福颐以及他的门人后学，已编了不少的材料书和字书。”⁴这些书，包括罗福颐的《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两书，和雪堂弟子容庚《金文编》、《金文续编》等书。罗福颐、容庚在罗振玉指导下以《说文》为纲整理金石文字的贡献，正是古典金石学借鉴《说文》学利器，为古文字学建立材料序列的成就。

¹ 按：此文三见，第一见为1930年蟬隐庐版《古玺文字征》和《汉印文字征》合订本第八册跋文，第二见为1982年文物出版社版《汉印文字征》的自序二，第三见为2010年紫禁城出版社版《增订汉印文字征》的自序一。以下凡说到此文，均从第一见名义，称1930年跋文，但引文所注出处，使用《增订汉印文字征》的页码。

² 罗福颐：《增订汉印文字征》，第9～10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³ 唐兰：《中国文字学》，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⁴ 唐兰：《中国文字学》，第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增订汉印文字征》已重印毕，笔者作为责任编辑，仍觉遗憾：一是没有恢复蟬隐庐版的每一重文下注出的所据谱集略字，二是1978年文物版《汉印文字征》有《凡例》，增订版无；三是罗振玉序文的1931年《辽居乙稿》本，是否收录，尚无定见。留此三憾，有笔者事先未能深入调查之责。

关于署名，符合事实的确切方式应是：罗福颐著，罗随祖增订。往日，笔者曾建议采用这种署名方式。罗随祖恪守人子敬虔之诚，答曰不敢，遂有增订之实，无附骥之名。此事亦当说明。

《汉印文字征》一书，前有雪堂指导，传授凿破混沌心得；继而子期立著，架构新序，别开生面，古玺、汉印，各自归属，积珠累镞，精密分彙；今有随祖增订，秉持家学，操觚不辍。八十年间，祖孙用心一书，今又重印，日后必有继续。自民国已降，三世一脉，一书四修，且立于学林而代有嘉誉，能再有相埒者乎。其间道理，足以令人动探究之心。

此外，关于书中摹写字形、释文和体例，学界有人专事研究，提出过新的意见¹。这不仅是学术进步，也是此书受到学术界重视的一个明证。

今就所得所识，一一缕述，作为小结，题名述略，为关心《汉印文字征》者，探书中理，广书外事。倘有博雅君子阅后谓余不足，敬待指教。

是为《增订汉印文字征》重印后评介。

此文草于2010年12月，今罗福颐先生是书已第三次印刷。文中所言罗振玉序言《辽居乙稿》本事，罗随祖先生已附缀校语于序文之后。2012年7月特识。——作者。

[作者单位：故宫出版社]

(责任编辑：陶晓姗)

¹ 张维嘉：《〈汉印文字征〉及其〈补遗〉校订》，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